

茨威格传记精华

黄明嘉 刘泽珪 主编

人文之光

托尔斯泰 ● 伊拉斯谟

〔奥地利〕斯·茨威格 著

魏育青 俞宙明 译

漓江出版社

读伟人的传记吧，

与勇敢的心灵做伴！

茨威格传记精华

黄明嘉 刘泽珪 主编

人文之光

托尔斯泰·伊拉斯谟

[奥地利] 斯·茨威格 著

魏育青 俞宙明 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之光 / (奥地利)茨威格 (Zweig, S.) 著; 魏育青, 俞宙明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9. 7

(茨威格传记精华)

ISBN 7-5407-2419-6

I. 人… II. ①茨… ②魏… ③俞… III. 传记文学-作品集-奥地利 N.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1711 号

人文之光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著

魏育青 俞宙明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84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ISBN 7-5407-2419-6/I · 1460

定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伊拉斯谟的成功与悲剧	魏育青 译
使命与人生意义	(5)
时代一瞥	(16)
惨淡的早年	(21)
肖 像	(37)
大师的年代	(46)
人文主义的伟大与局限	(58)
劲 敌	(75)
为独立而战	(98)
鏖 战	(111)
结 局	(125)
伊拉斯谟的遗嘱	(136)

托尔斯泰 俞宙明 译

序 曲	(143)
肖 像	(147)
生命力与其对立面	(152)
艺术家	(165)
自我描述	(178)
危机与转变	(185)
做作的基督徒	(192)
教义及其荒谬	(201)
为了实现而斗争	(216)
托尔斯泰生命中的一天	(229)
抉择与神化	(241)
逃往上帝	(247)
尾 声	(252)

伊拉斯谟的成功与悲剧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著
魏育青 译

我想打听伊拉斯谟·封·鹿特丹是否属于某一派别。一个商人这样答道：伊拉斯谟始终特立独行。

——《蒙昧者书简》，1515年

使命与人生意义

伊拉斯谟·封·鹿特丹是他所处的那个世纪最大的荣耀，无比辉煌。但不容否认，今天这几乎只是一个名字罢了。他的著述浩如烟海，是以一种被忘却的超民族语言即人文主义的拉丁语写就，如今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当年声震寰宇的作品如今问津者寥寥。他个人的形象充满矛盾，忽隐忽现，难以捉摸，在其他一些孔武有力、慷慨激昂的世界宗教改革家的阴影笼罩下并不起眼。他的私生活也干巴巴的，不是什么有趣的谈资，默默埋头工作者通常不会有动人的履历。甚至连他真正的业绩也不为现代人所知，就像大厦落成之后基石便湮没无闻了。有鉴于此，我们先要明确而概括地指出，是什么使伊拉斯谟·封·鹿特丹这位被遗忘的伟人今天依然或者说尤其弥足珍贵。在西方所有笔耕者和创作者中间，他是第一位有意识的欧洲人，是第一位勇敢的和平之友，是人文主义善待尘世和精神的理想最雄辩的律师。在为更加公正、更有共识地构筑我们的精神世界的斗争中，他始终是失败者；但这悲剧性的命运更使他赢得了我们手足般的深情。伊拉斯谟热爱许多我们所热爱的东西，爱诗和哲学，爱书和艺术品，爱各种语言和各个民族，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地爱全人类，旨在完成促进道德化的任务。确实，在人世间只有一样东西

是他视为理性之敌而深恶痛绝的：狂热偏激。不狂热、不偏激惟他为最。作为哲人，他也许不是第一流的，但却是最博学的。作为善者，他也许并不洋溢着慈悲，但却具备正直的友情。在他看来，倘若不能容忍异己的思想，那么无论采取何种形式，这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原罪。他坚信，任何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几乎都能通过相互忍让而平息，因为大家都身处人性的领地；任何矛盾几乎都能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如果不是总有些人吆五喝六、推波助澜和把战争的弓弦绷得紧紧的话。因此，伊拉斯谟反对任何形式的狂热偏激，不管宗教领域的还是民族领域或者世界观方面的狂热偏激，都是天生死硬派的行为，是这些死硬派破坏了人类的相互理解。他痛恨执迷不悟、思想片面的人，无论他们披的是教士的法衣还是教授的长袍。他痛恨戴着眼罩的思想家和宗教狂，无论他们属于哪一等级、哪一种族，这些家伙到处都在要求别人盲从他们的观点，不屑一顾地将所有不同意见都称为异教或者无耻行径。伊拉斯谟从不将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也坚决抵制任何逼他奉行某种宗教或政治信仰的尝试。思想的独立，对他而言这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管是在布道坛还是在讲台上，如果有谁站起来宣传个人的真理，似乎这是上帝传于他并且是独传于他的福音，那么，在伊拉斯谟这位自由思想者看来，都是阉割了世界神圣的多元化。因此，他毕生都在倾其全部火花闪烁、令人折服的智慧力量，在一切领域里与那些自以为是、执迷不悟的狂热者作斗争，只是在为数甚少的幸运时刻才看着他们发笑。在这些比较温和的瞬间，他觉得死板的狂热主义只是可怜的精神狭隘的表现，只是无数“愚蠢”中的一种罢了——在《愚人颂》中，他以轻松的漫画笔触分门别类地描述了形形色色的“愚蠢”。作为一位不带任何偏见的真正的正义者，他甚至对自己的死敌都不无理解和同情，在内心深处他始终明白，狂热主

义这人性的灾星会毁了他自己宽容的世界，会毁了他的生活。

伊拉斯谟的使命和生活意义在于以人文主义的精神使对立归于和谐。他天生就是一个联合者，或者用与他颇为类似的歌德在拒斥所有极端这一点上的话来说，具备“沟通的本性”。任何暴力革命、任何“骚乱”以及任何七嘴八舌吵得天昏地暗的胡闹，在他看来都有悖于世界理性的清明本质。他觉得自己有义务默默地做这世界理性的忠诚使者。他觉得尤其是战争与道德思维的人类格格不入，因为战争是最野蛮粗暴的解决内在冲突的方式。通过善意的理解来化解冲突，澄清乱局，平息纷争，使得分歧各方重归于好，赋予相互割裂者较高层次的共性，这项不可多得的艺术体现了具有忍耐天才的伊拉斯谟真正的力量。同时代的人怀着感激的心情，干脆将这种多功能的理解意志称作“伊拉斯谟特性”。

他要单枪匹马地为“伊拉斯谟特性”赢得整个世界。因为他集形形色色的创造性于一身，既是文学家，又是语文学家、神学家和教育家，所以他相信，在全世界范围内，即使那些乍一看不共戴天者也可能联合起来；没有什么是他的斡旋术做不到的或者不了解的。对伊拉斯谟来说，耶稣和苏格拉底之间、基督教教义和古希腊罗马智慧之间、虔诚和德行之间不存在什么不可调和的道德对立。他是被授予圣职的教士，却以宽容之心将异教徒接入自己的精神天国，使他们与众教士兄弟般地共处。在他眼里，哲学虽然是另一种但却和神学一样是纯洁的寻求上帝的形式。他虔诚地仰望基督教的苍穹，也同样感激地仰望希腊的奥林匹克山峰。与加尔文等宗教狂不同，他不把洋溢着感官之乐的文艺复兴运动视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宿敌，而是视为其比较开放的姐妹。他处处无家处处家，作为第一位有意识的世界公民和欧洲人，他根本不承认某一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因为他内心养成了

这样的习惯，即评价民族时以其各自最高尚、最完美的俊杰和精英为惟一尺度，所以各民族在他看来都是可爱的。将各国度、各种族、各阶层的此类思想正直者召集起来，结成一个有教养者的大同盟，伊拉斯谟以这种高尚的尝试作为自己真正的生活目的。他还把拉丁语这一超越各民族语言的语言提炼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沟通语言，从而在对世界意义重大的一刻为欧洲各国人民创造了一种超民族的统一思维形式和表达形式——这一功绩世人难以忘怀！他知识广博，万分感激地回首以往。他信念虔诚，满怀信心地瞻望未来。但对尘世间的野蛮，对始终充满敌意、不断地笨拙而又恶毒地企图搅乱上帝计划的野蛮，他却一直不屑一顾。只有塑造性和原创性的高尚领域才会对他产生同胞手足般的亲和力。他认定每位思想家都应以扩展这一领域为己任，使它像阳光一样纯净地普照全人类。这种早期人文主义最内在的信仰（也是最美好、最具悲剧性的错误）就是：伊拉斯谟及其同道者认为人类有可能通过启蒙而进步，希望通过教育、文字、研究和书籍的普及使个人和集体都具有可塑性。这些早期的理想主义者令人感动地、几乎是宗教式地坚信，持之以恒地提倡学习和读书就能使人性趋于高贵。作为一位视书为神圣的学者，伊拉斯谟从不怀疑德行是完全可以传授、可以学习的。在他的梦想中，人类的和谐化已近在咫尺，因此，生命的全面和谐化在他看来也是不成问题的。

这种高尚的梦想确实令人振奋，宛如一块强大的磁石吸引着当时各国的佼佼者。在有道德情感者看来，倘若没有这种给人带来慰藉的想法，没有这种扩展心灵空间的幻觉，即个人也能以自己的所愿所为对世界的普遍道德化作出一份贡献，那么自己的存在就是不足道、无实质的。我们的现在只是通往更完美境界的阶梯，只是为完美得多的生命过程所作的准备而已。谁能以一

种新的理想证明这憧憬人类道德进步的力量，谁就是他那一代人的领袖。伊拉斯谟便是如此。他以人文主义精神统一欧洲的思想适逢其时，因为世纪之交的重大发现和发明、文艺复兴带来的科学和艺术革新在全欧洲早就成了一种喜人的超民族的集体经历。经过这么多年的压抑之后，对使命的信念第一次重新使西方世界振作起来，各国理想主义的顶尖力量从四面八方拥向人文主义的阵营。所有人都有志于在这个教育的领域里成为公民，成为世界公民；皇帝和教皇、诸侯和教士、艺术家和政治家、青年和妇女争相接受艺术和科学的教育，拉丁语成了他们赖以密切交往的共同语言，成了第一种精神领域的世界语。让我们赞美这一事业吧！古罗马文明崩溃之后，全靠了伊拉斯谟的学者共和国，全欧共同文化才得以重新孕生，手足情深的理想主义团体第一次不是以某个民族的虚荣而是以全人类的福祉为鹄的。崇尚精神者要求在精神中联合起来，各种语言要求在一种超语言中相互沟通，各个民族要求在超民族性中最终得到安宁。这种要求的提出是理性的胜利，也是伊拉斯谟的胜利，是他对世界意义重大的一刻。这一刻是神圣的，然而却是稍纵即逝的。

可为什么——这是个令人痛苦的问题——一个如此纯粹的王国不能持久呢？人类早就受到这样的教导，即任何敌意都是荒唐的，可为什么偏偏总是“伊拉斯谟特性”之类倡导精神沟通的高尚人文理想不能在人间形成真正的力量呢？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清楚地看到并且承认，理想永远不可能使大众彻底满足，他们的眼睛只是盯着一般意义上的享福；在芸芸众生那里，仇恨也在要求自身阴暗的权利，试图和纯粹之爱的力量平起平坐；人都自私自利，无论面对什么理念，他们只想尽快从中捞到好处。具体的、唾手可得的东西总是比抽象的东西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因此，在政治方面总是某些口号最容易找到追随者，这类口号宣告

的不是理想而是敌意，是轻轻松松就能理解和把握的与其他阶层、种族和宗教对立；在仇恨的柴堆上最容易点燃狂热主义罪恶的火苗。伊拉斯谟纯粹重联合的、超民族的、泛人性的理想则相反，对那些想要斗士般直面敌手的青年人而言，它当然不能留下什么视觉上的深刻印象，也永远不会带来强烈的诱惑，远远不及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它在自己的国界或教会之外总能发现敌人。因此，宗派精神总能轻而易举地将人皆有之的不满情绪朝着某一特定方向驱赶；而人文主义，容不下半点怨恨的伊拉斯谟学说，则英雄般地为了实现一个遥远的、几乎看不见的目标而不懈努力；只要梦寐以求的“大众”即欧罗巴民族尚未成为现实，它就依然是一种精神贵族的理想。因此，那些充满理想但又洞察人性的、对未来人类的相互理解深信不疑者必须明白，他们的事业始终受到永远是非理性的激情的威胁；他们必须发扬献身精神并且始终意识到，从人的本能欲望的深谷不断会有狂热主义的大潮奔涌而来，淹没和冲垮所有堤坝。几乎每一代人都会经历一次这样的挫折，此时的道德任务就是渡过难关而内心不乱。

伊拉斯谟个人的悲剧在于，偏偏是他这个所有人中最不狂热、最反狂热者，而且偏偏是在超民族理想第一次以胜利之光普照欧洲的时刻，卷入了一场民族宗教的狂热。这次大众狂热的势头之猛堪称史无前例。一般来说，那些我们认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根本不会渗入活生生的大众意识，即使战争的狂澜在此前的几个世纪中也只是波及几个民族、几个地区。一般而言，在社会或宗教冲突中，哲人能够不受干扰，心境坦然地对政治狂热视而不见——歌德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拿破仑战争的乱世中仍能我行我素地潜心精神创作。但有时——当然在几百年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也会产生紧张的对立，其张力如此之

强，以致整个世界像一块布被撕成两半，巨大的裂痕横贯每个国家、每座城市、每幢建筑、每户人家和每颗心灵。来自大众的超强压力将个人团团围住，个人无力反抗，无力摆脱集体妄想；面对相互碰撞的惊涛骇浪，不可能置身度外觅得一块安全的栖息地。世界如此彻底的分裂可能因为某种社会问题、宗教问题或者其他什么精神和理论问题的摩擦而起火，但实际上对狂热主义者来说，由什么材料点燃是无所谓的，只要自己能烧起来并烈焰腾腾就行，只要能释放自己郁积的仇恨力量就行。正是在这种大众妄想的世界末日，战争的恶魔最容易挣脱理性的锁链，无拘无束、兴致勃勃地扑向人世。

在这大众妄想、人世分裂的可怖时刻，个人意志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哲人们想要躲在远处冷眼旁观，但这谈何容易，时代将他们卷进左派或右派的喧嚣，强迫他们加入这一行列或那一团伙，强迫他们高喊这一口号或拥护那一党派。在这样的时代，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混战者中谁也比不上拒斥团伙妄想和片面思维的中立者更需要勇气、力量和道德坚定性。伊拉斯谟的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作为第一个德意志宗教改革家（其实是惟一的一个德意志宗教改革家，因为其他人与其说是宗教改革家，毋宁说是宗教革命家），他试图根据理性的法则对天主教会进行改革，但命运却使他和路德分庭抗礼；伊拉斯谟是目光远大的思想家和进化论者，而路德则是实干家和革命者，被德意志幽暗神秘的民族力量推动着。文弱的伊拉斯谟手中只有区区一支笔，他想抖抖索索地连接起来的东西被马丁博士农夫般的铁拳一下子砸烂了。基督教世界、欧洲世界将要分裂达几世纪之久，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对峙，北方与南方对抗，日耳曼语族与罗马语族对立——此刻德意志人、西方人只能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作出决断：不是崇奉教皇就是追随路德，不是天主教专权便是新教福

音。然而伊拉斯谟——这是他值得后人纪念的行为——在当时的领袖人物中是惟一拒绝明确表态的。他既未站到教会一边，也没有站到宗教改革运动一边，而是对两者都有感情上的联系。他出于信仰第一个要求和促进新教的发展，但也将天主教视为堕落的世界中最后一种精神统一形式而加以捍卫。左是偏激右也是偏激，左是狂热主义右也是狂热主义，他这位矢志不渝的反狂热主义者不愿为任何一种偏激服务，而是惟独尊奉自己永恒的尺度即正义。为了把普遍人性和共同文化财富从这种纷争中解救出来，他徒劳地居中斡旋。而“居中”，站在中间，就意味着站在最危险的地方。他试图赤手空拳地调和水火，使这一派的狂热分子和那一派的狂热分子握手言欢。这种努力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所以就显得加倍伟大。起先双方都没有理解他的立场，以为他说话口气和缓是可以争取到自己一边来的。等到他们发觉，这位自由思想者不会对任何他人的观点表示赞美和效忠，也不愿为任何教条提供火力掩护，于是，仇恨和嘲讽就从左右两个阵营劈头盖脸地向他袭来。伊拉斯谟无意依附任何一派，所以两派都和他闹翻了。“教皇派^①视我为皇帝派^②，皇帝派则视我为教皇派。”新教徒路德拼命诅咒他的名字，天主教会则将他的著作一股脑儿全都列入禁书目录。但无论威胁还是谩骂都不能使伊拉斯谟投身这一派或那一派；我不想傍人门户，是他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一以贯之的座右铭。面对政客、领袖或者误导人们片面狂热的骗子，艺术家或者伊拉斯谟所指的哲人的任务就是做一个理解者和中介者，做一个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他不必站在任何阵线上，只消与所有自由思想的公敌为敌，与所有狂热主义为敌；他

① 指教皇政策的支持者。

② 指意大利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支持者。

无需避开任何党派，因为设身处地想一切人性之所想乃是艺术家的天职，他只要超越任何党派，超越纷争，反对这种偏激，也反对那种偏激，反对任何偏激中都有的那种不祥的、荒唐的仇恨情绪。

伊拉斯谟的这种态度，这种不决断的态度，或者准确地说，这种“不愿作出决断”的态度，被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极为简单化地称为怯懦。这位思路清晰的犹疑者被视作温吞水和墙头草而遭到嘲笑。确实，伊拉斯谟不像温克里特^①那样敞开胸膛直面人世，他不是那种具有大无畏英雄气概的人。他小心翼翼地弯向一边，又芦苇般彬彬有礼地左右摇摆起来；但这只是为了免遭折断，只是为了不断重新站直而已。他并不像展示圣体那样炫耀自己对独立性的认同，炫耀自己不想傍人门户的立场，而是深藏不露，像小偷的鬼灯一样藏在长袍里。在大众妄想产生最疯狂的冲突时，他间或会沿着隐蔽的小道溜走，躲进洞穴避难。但是——这是最关键的——他使自己的精神珍宝和人类信念免受当时可怕的仇恨飓风的破坏和摧残，将其丝毫无损地带回了家园。在这闪烁着星星之火的烛芯上，不但斯宾诺莎、莱辛和伏尔泰点燃了他们的火把，而且所有未来的欧洲人都能点燃他们的火把。在精神上同属一代的人之中，惟独他与其说是忠于某一部族，毋宁说是更忠于全人类。他不是在沙场上，也不属于任何一支队伍，而是在两个阵营的夹攻之下死去了，孤单单的，但却是——这是最关键的——独立和自由的。

历史对战败者是不公正的。它不怎么喜欢有分寸的人，不怎么喜欢斡旋和调解的人，不怎么喜欢有人性的人。感情激昂者才

^① 瑞士传说中的民族英雄，曾在一次大战中将敌军手中的许多长矛拖住扎进自己的胸膛，从而为同伴打开了通道。

是它的宠儿，不知适可而止的人、在思想和行为方面肆无忌惮的冒险家才是它的宠儿。所以，它对伊拉斯谟这位沉默的人性之仆几乎不屑一顾。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宏伟画卷上，伊拉斯谟被隐没在背景之中。其他人，所有那些因其天才和信仰而心醉神迷的人，戏剧性地承受了各自的命运。胡斯^①在熊熊烈焰之中窒息而死，萨伏那罗拉^②在佛罗伦萨的火刑柱上丧生，塞尔维特^③被宗教狂加尔文^④推入烈火。这些人都经历了自己悲剧性的一刻：托马斯·闵采尔^⑤被人用烧红的铁钳严刑拷打，约翰·诺克斯^⑥被钉在苦役船上，两腿叉开插入德意志大地的路德面对皇帝和帝国高吼：“我别无选择！”托马斯·莫尔^⑦和约翰·费雪^⑧的头颅被按倒在刽子手的木刑具上，茨温利^⑨被刺棒打死，倒在卡普尔^⑩的田野上——这些形象令人难忘，他们在虔信的怒火中反抗，在苦难中销魂，在命运中显出悲壮。在他们背后，宗教妄想的灾难之火呈燎原之势，农民战争荡平的城堡以亵渎的方式为遭到宗教狂热分子各种各样误解的基督作证。三十年战争和百年战争时城市被夷为平地，农庄被洗劫一空。这些世界末日般的惨状在控诉，控诉尘世面对上天不愿屈服这种非理性的行为。

① 胡斯(约1369～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

② 萨伏那罗拉(1452～1498)，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

③ 塞尔维特(约1511～1553)，西班牙医生、法学家和宗教哲学家。

④ 加尔文(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家，基督教加尔文宗创始人。

⑤ 托马斯·闵采尔(约1490～1525)，德国农民战争领袖，宗教改革家。

⑥ 约翰·诺克斯(约1515～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苏格兰长老会创始人。

⑦ 托马斯·莫尔(1478～1531)，英国政治家，人文主义者。

⑧ 约翰·费雪(1459～1535)，英国人文主义者。

⑨ 茨温利(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运动领袖。

⑩ 卡普尔，瑞士地名。